



《孟子》中的规矩之道

□ 满新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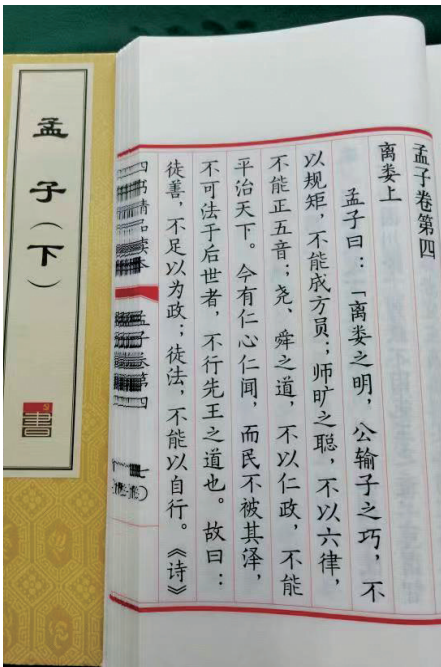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尊为“亚圣”，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一书是孟子言论的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全书共七篇，篇目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又分上下。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列为“四书”，该书由此升格为儒家的主要经典，成为士人们的必读书之一。

《孟子》记录着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孟子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提出“王道”“仁政”的政治学说，倡导“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诸侯割据争霸，政局动荡混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希望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此，《孟子》中有不少关于规矩的论述，体现了他的规矩之道。

重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规矩，即规和矩，指圆规和曲尺，原意为校正圆形和方形的工具，后引申为标准、规范、法则、制度等。在《孟子·离娄上》第一章中，孟子开门见山揭示了规矩的重要性。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相传是黄帝时期目力极强的人，能于百步之外望见秋毫之末。公输子，即公输班，鲁国人，因之又叫“鲁班”，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师旷，春秋时期晋国著名乐师、音乐家，辨音力极强。孟子强调，即使以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与曲尺，也不能准确画出圆形和方形；即使有师旷那样好的听力，如果不按照六律，也不能校正好五音；即使有尧舜的学说，如果不行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在这里，孟子从成“方圆”的“规矩”、正“五音”的“六律”，引申出治理国家也需要有规可循。

治理国家的规矩来自哪里？在孟子心中，治理国家最好的规矩是效法尧舜的“先王之道”，实行仁政，因为尧舜正是其性善论的典范。同时，孟子强调仁政的关键在于“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他认为无论多么好的治国理念，如果君王只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达成不了仁政的。相反，只有良法而无具有



德行的人来实施，这些好制度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因为制度要靠人落实、靠人去行动。让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只能是把他的恶行传播给百姓。所以，圣人“既竭心思”，穷尽脑力，再坚持“仁政”这一标准，仁爱德义就覆盖天下了。

规矩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规矩会怎样？《孟子·离娄上》中道：“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在孟子看来，如果国家治理缺少规矩，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没有规章法度，朝廷不信道义，工匠不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那实在是太侥幸了。所以，相比于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礼义、教化和先王之道对国家更为重要。如果上位的人没有礼义，下位的人缺少教育，违法乱纪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灭亡也就快了。

学规矩：人人皆可为尧舜

孟子强调必须按照规矩的标准做人做事。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他以圆规和曲尺是方圆的最高标准，引申出圣人是做人的最高典范。认为想成为好君主，就要尽君主之道；想成为好臣子，就要尽臣子之道，而君道和臣道

的标准就是圣人，即效法尧舜。孟子主张规矩不能随意改废。他举例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后羿教人射箭时，一定拉满弓，学的人也要努力拉满弓。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一定依循规矩，学的人也必须依循规矩。这里，孟子认识到只有坚持按规矩做事，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规矩，该用什么方法？公孙丑苦于入道之难，曾因此问孟子，圣人之道很高很好，但追求它就像登天一样，似乎高不可攀，能不能降低一些，使其变为可望又可及的目标，从而鼓励人们每天坚持不懈地追求呢？孟子认为，真理不能降格以求，不能因标准难以达到就降低目标。如《孟子·尽心上》中道：“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轂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赞赏地指出，高明的工匠不会因为拙劣工人而改变或废弃规矩，后羿也不会因为拙劣的射手而改变拉弓的标准。君子教导别人正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只是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站立在道的中间，有能力的人便跟随而来。孟子认为，不能因为学习能力不足而降低规矩的标准，但教的人要注重启发引导。再如，《孟子·尽心下》中道：“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轮舆指古代制作器具、房屋、车轮、车厢的四种工匠，此处泛指工匠。这里，孟子告诫人们，能工巧匠只能教给人制作的规矩和法则，却不能使人一定具有高明的技巧，技巧只能靠自己琢磨去寻求。强调学习规矩仅凭老师教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圣人并不是高不可攀，只要遵循规矩努力去做，“人人皆可为尧舜”。

守规矩：仁义礼智根于心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而仁政的实施依据是人内在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实现方式是行先王之道，中间环节是人各修其身。因此，孟子尤其重视规矩对治国修身的规范作用。他基于“性善论”，创造性地提出“四心”“四端”和“四德”。《孟子·公孙丑上》中道：“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孟子看来，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发端，“四端”就像人的肢体一样，是与生俱来的。用“四心”规范人的行为，把根植

于心的仁义礼智，外化到日常行为当中去，才能更好地守规矩。

首先，要有侧隐之心。侧隐之心就是同情心，孟子称之为“仁”。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即“侧隐之心”，是人生来就具有的道德本能，是人们向善之心自然流露的一种外在情感表现。正是因为有了侧隐之心，人们懂得了忍耐与忍让，学会了善待他人，使“仁”“爱”成为待人接物的标准。侧隐之心希望行善避恶，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次，要有羞恶之心。羞恶之心就是羞耻心，孟子称之为“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认为，人不能没有羞耻，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才是最大的羞耻。义指正道、正直、道义，它对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规范。“义”与“耻”提醒人们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告诫人们必须坚守的规矩底线，是守住规矩的第一道闸门。再次，要有辞让之心。辞让之心就是恭敬之心，是指人对人对物要心怀敬畏，孟子称之为“礼”。“礼”是把“仁义”的要求具化，进而成为道德的准绳，对人的道德行为进行规范与节制。心有所畏，才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最终达到“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最后，要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指明辨是非的能力，是对自我或他人言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判断和表达，因此被孟子称之为“智”。社会中充满各种诱惑，什么是正当的，是应该追求的，什么是错误的，是需要摒弃的，人们必须不断积累自己的“智”，才能明辨是非。

孟子的规矩之道，为后人提高规矩意识提供了思想典范。坐落于山东邹城的孟府，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孟府大堂正中门楣上悬挂着“七篇贻矩”匾匾，由清雍正皇帝御赐。“七篇”是说《孟子》共七篇；“贻”有赠与的意思；“矩”就是规矩。“七篇贻矩”是指孟子的学说是修身处事、励志为人的规矩。大堂的东西两侧分别放置着日晷和嘉量，这是我国古代的计时仪器和计量工具。日晷、嘉量是规矩的物化象征，时刻提醒人们要用标准的尺度和规范来约束行为，寓意后人要知廉耻、懂敬畏、讲规矩，行人间正道。

历史文化



“柯地会盟”与“北击山戎”

□ 崔 敏 王怡然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第十六位国君，他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人，曾经多次与诸侯订立盟约，无论对方是敌人还是朋友，即使是订立了不利于自己的盟约，他也能遵守，因而在诸侯中的威信很高。

齐桓公出兵讨伐鲁国，齐国大军一直进攻到距离鲁国都城只有五十里的地方，把鲁军打得大败，鲁庄公不得不提出在柯地会盟，并献邑求和。齐桓公很高兴，答应了鲁庄公，并要求他在三天后与自己会盟。第二天，鲁庄公麾下力士曹沫在怀里藏了兵器来到会盟之地，此时齐桓公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恭候多时。正当鲁公与桓公即将达成协议之时，曹沫手执匕首冲上前去，劫持了齐桓公。管仲等人虽想救齐王，但怕伤到齐王，也不敢轻举妄动。齐桓公问：你想要怎样？曹沫说：齐强鲁弱，您恃强

凌弱，侵占鲁国。大王您认为该怎么办呢！齐桓公迫不得已只好同意，并为此签订了盟约。

齐桓公回国以后，十分懊丧，想毁约食言，不还给鲁国土地。而管仲则劝他说：如果背信，则失信于诸侯，就难以建立功业。还给它土地，这样虽然失去了土地，但大王能在天下人面前显示出您的诚信。最后，齐桓公终于将侵占的鲁地归还鲁国。诸侯们听到此次还地之事，都认为齐桓公言而有信，能遵守盟约，都愿意归附齐国。

山戎攻打燕国时，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得到消息后有些顾虑，因为中原军队主要是由车兵、步兵组成，而山戎全为骑兵，行动迅速，冲击力强。齐军出击，怕难以取胜，又蒙受重大损失。管仲对齐桓公说：如今燕国危急，若不救援，就失信于众诸侯了，大王称

霸大业岂不就付诸东流了？而且山戎久为中原之患，驱走山戎势在必行。管仲又说：现在出兵虽有困难，但是燕、戎交战已经长达三个月了，双方将士都已疲惫不堪，此时全力出击，可操胜算。若不出兵，燕国被灭，山戎就将威胁到我们齐国的安全，结果是先失信于众诸侯，后又面对山戎的兵马，而我们齐国将不得安宁。听了管仲的分析，齐桓公疑虑顿消，并亲自领兵出征，大胜山戎，并把其驱逐到孤竹才回师。

燕庄公绝处逢生，十分感激齐国的救援，率满朝文武出城来迎接齐桓公，热情地把齐桓公一直送到齐国的境界内。齐桓公说：我不能对燕国无礼，诸侯相送不能出国界，这是规矩。因此，你把我送到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土地。于是，齐桓公就把这块本来属于齐国的土地划给了燕国。诸侯们听说这件事

后，都赞扬齐桓公，对他更加钦佩了。

燕庄公是盟友，齐桓公对盟友讲诚信；鲁庄公是敌人，齐桓公对敌人也能讲诚信，更何况对其他的人呢？虽然齐桓公守信守礼会导致一时所失，但最后却大有所得。到鄆地会盟时，各诸侯国推举齐桓公为盟主，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开始确立。幽地会盟，各诸侯国再推齐桓公为盟主，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守信守礼的齐桓公多次成功盟会诸侯，各个诸侯国也更加依附和钦佩齐国。自此，齐国春秋霸主的地位得以奠定和巩固。



王仁堪（1849—1893年），字可庄，又字忍庵，号公定，福建闽县人，是晚清时期“清流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同治九年（1870年）考中举人，光绪三年（1877年）高中状元。光绪五年（1879年）因使臣崇厚擅自与俄人订立割地卖国条约，王仁堪偕翰林院修撰曹鸿勋等上疏弹劾。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为庆寿辰，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王仁堪上书反对。光绪十六年（1890年）被外放为镇江知府。镇江三年的从政生涯充分展示了他的施政才能和实心为民的为官风范。

知民利病 施政为民

王仁堪在镇江知府任上，为加强地方治安管理创立了保甲制度。当时长江一带有匪患发生，尤其是当地的土匪纠集英人惹事扰民。王仁堪亲自巡防，并禀请两江总督给各国总领事发文书，要求他们制定章程，对无业洋人严加管制，凡有犯罪行为均与当地百姓一律论处，终于消除当地的匪患。

王仁堪认为，“亲民之官当知民之利病”。在镇江上任以后，他遍察民情，几乎走遍了辖区的每个角落。他发现镇江许多地区没有水源，容易发生旱灾，提出开设渠塘、兴修水利是当务之急。但考虑到库银不足，请求拨款无望，又不愿摊派扰民，自己带头捐出俸银，还写信向亲戚朋友求助。镇江商富感动之余纷纷捐输。先后在丹阳、丹徒两县开挖大小河塘，又建起了大量沟、渠、闸、坝等水利实施，不仅促进了粮棉生产，而且便利了商旅交通。光绪十八年（1892年）镇江遭遇大旱灾，王仁堪奏请截留漕米五万斛，救济了20多万饥民，并募款办理各种救灾的善后，如捕蝗、牛瘟、浚河、种树、积谷等。

知人善用 崇学重教

同治九年（1870年）王仁堪在顺天乡试硃卷中写道：“国家不患无才，患有才而不用其才，尤患有才而轻用其才。”王仁堪任提督山西学政期间，结合时弊整顿学风，严禁生员吸食鸦片；在出任贵州、江南、广东三省乡试副考官时，选拔出梁启超、汪兆铭等一批优秀人才；任教习庶吉士时，民国总统徐世昌是其学生；镇江任职时，他知人善用，严格要求，如重用丹阳县令查文清，丹徒县令王芝兰，地方乡绅韩弼元、柳恂、严作霖、鲍上传等，他们都给镇江百姓带来了福祉。

王仁堪了解到镇江近百年来年轻人较少读书和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将救灾募捐剩余款项并出私钱用于创办赧思文社、南兰书舍（今镇江中学）作为治经讲学之所，并命所属各区设立义塾，普及民间教育。他亲自带人在金山脚下勘察、清淤，修复中冷泉，并题写了“天下第一泉”五个大字，为镇江保存了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为延续文脉，王仁堪对重建金山文宗阁进行了精心筹谋，从费用的估算、筹集路径等方面制定了一套修复实施计划，后因调任，计划被搁浅。

晚清镇江知府王仁堪的为官风范

□ 张 雯

以身作则 清廉自守

王仁堪在镇江的府署屋宇破旧不堪，因“年久失修，墙垣剥落，间有鼓裂，砖瓦残缺，门窗朽败，风雨渗漏，每多不堪居处”，“恐风吹雪压，日就倾圮”，不得已才做一些简单修缮。这个府署是官府提供给王仁堪办公及全家居住的地方，属于官府所有。修葺的费用，王仁堪却是申请预支自己的养廉银来偿还事先支付的借款，剩余部分分摊到每年的办公费中去。

当三年任满考绩时，江苏省定王仁堪的政绩为全省第一。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王仁堪被调任苏州，镇江“士民夹道欢送，乃至攀辕哭泣”。士绅欲为其设宴饯行，被他婉言谢绝，于是大家便以中冷泉水相送，以表达景仰之情。在苏州任职不到3个月，因积劳成疾，王仁堪溘然病逝，年仅45岁。名士张謇前往吊唁时为其清贫感慨不已：“身后公私并负七千餘金。公负七千金，督、抚代筹，私负则渺然无著。堂有老母，下有七子，归无一椽寸陇也。高科荣进，修志清名，其终如此耳，可胜慨哉！”可见王仁堪多次捐廉捐俸甚至为了公事举债，家庭负担沉重。

为了纪念王仁堪，镇江百姓在西郊中冷泉南建了一座“王公祠”，由当时名人樊增祥撰文，陈宝琛书碑。泉畔建造了八角凉亭，名“鉴亭”，意取王仁堪高风亮节，如池水清澄鉴人。为向后人展示王仁堪勤政廉洁的珍贵史料，2017年镇江建成王仁堪纪念馆，馆内对联写道：“为民爱民亲民伟绩丰功垂青史，廉政勤政实政高风亮节启后人”，这正是王仁堪为官风范的高度概括。